

陈祖武 著

中國學案史

任繼愈題



東方出版中心

陈祖武 著

中國學案史

東方出版中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学案史/陈祖武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
2008. 12

ISBN 978 - 7 - 80186 - 908 - 1

I. 中… II. 陈… III. 哲学史—中国 IV. B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51314 号

中国学案史

出版发行: 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: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

电 话: 62417400

邮政编码: 200336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 本: 710×1020 毫米 1/16

字 数: 223 千字

印 张: 17

版 次: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80186 - 908 - 1

定 价: 40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自 序

中国历代史籍，不唯以浩如烟海而令人叹为观止，而且还以其编纂体裁的完备而自豪于世。编年、纪传、纪事本末若三足鼎峙，源远流长，争奇斗妍，为史籍编纂确立了基本格局。其间所派生的各种专史，或通古为体，或断代成书，或记一族一姓，或述一地一时，博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学术文化诸领域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晚近以来，又融域外史籍编纂之精华为我所有，推陈出新，别辟蹊径，开创了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新局面。作为古代学术史的特有编纂形式，学案体史籍的兴起，是宋、元以后的事情。南宋朱子著《伊洛渊源录》开其端，明、清间周汝登、孙奇逢以《圣学宗传》、《理学宗传》畅其流，至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出而徽帜高悬。乾隆初，全祖望承宗羲父子未竟之志成《宋元学案》，学案体史籍臻于大备。清亡，徐世昌网罗旧日词臣辑《清儒学案》，学案体史籍至此极度成熟。梁启超并时而起，融会中西史学，以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而别开新境，学术史编纂最终翻过学案体之一页，迈入现代史学的门槛。

谈中国学案史而推祖于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，自梁启超先生首倡，今日已成史学界共识。然若究其发轫，则渊源甚远，来之有自。诸如先秦诸子之述学，汉唐纪传体史籍的挺生，佛家宗史、灯录的风行，北宋中理学的崛起，等等，凡此皆从不同角度为其提供了文献学和思想史的依据。在中国

学术史上,学案体史籍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。见盛观衰,述往思来,认真回顾这一历史过程,总结其间的成败得失和学术规律,对于推动学术史研究的深入,无疑是会有益处的。
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,笔者曾就此做过一次梳理尝试。承台湾文化大学邱镇京教授错爱,拙稿《中国学案史》有幸送请台北文津出版社付梓。自一九九四年习作在台湾问世,十余年过去,研究中国学案史,在今日的中国学术史研究中,依然还是一个可以深入开拓的领域。由于研究对象处于思想史、哲学史和史学史、文献学的交汇点上,随着学术史研究的向纵深推进,它愈益吸引研究者的注意。有鉴于此,遵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莫贵阳先生之嘱,谨将旧日书稿酌加增删,订讹正误,奉呈读者诸高贤,敬请方家大雅多赐教言。

陈祖武 谨识

二〇〇八年五月六日

目 录

第一章	学案体史籍溯源 / 1
一、先秦诸子论学术史 / 3	
二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发凡起例之功 / 7	
三、佛教史籍提供的借鉴 / 17	
第二章	学案雏形的问世 / 23
一、撰述背景 / 25	
二、《伊洛渊源录》之成书 / 31	
三、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/ 36	
四、学术价值 / 41	
第三章	阳明学与《圣学宗传》 / 45
一、道学统绪的延伸 / 47	
二、阳明学的崛起 / 50	
三、周汝登与《圣学宗传》 / 54	
第四章	理学危机与晚明学术 / 61
一、理学营垒中的“由王返朱”声浪 / 63	
二、经世思潮的兴起 / 68	
三、晚明的中西文化交流 / 72	
第五章	明清更迭与《理学宗传》 / 77
一、明清更迭与清初社会 / 79	
二、清初学术演进之大势 / 81	
三、孙奇逢学行述略 / 82	
四、《理学宗传》的结撰 / 85	

五、编纂体例及其影响 / 90

第六章 《明儒学案》的里程碑价值 / 95

一、从党争健将到学术巨擘 / 97

二、《明儒学案》成书时间商榷 / 104

三、主要内容及编纂体例 / 111

四、《明儒学案》与《皇明道统录》 / 124

第七章 《宋元学案》的纂修 / 127

一、黄氏父子的创始之功 / 129

二、全祖望与《宋元学案》 / 141

三、《宋元学案》的刊行 / 155

第八章 从《理学备考》到《学案小识》 / 159

一、康熙间的三部《理学备考》 / 161

二、朱子学的独尊与僵化 / 168

三、汉宋学术之争与《学案小识》 / 184

第九章 学案体史籍的殿军 / 203

一、会通汉宋以求新之晚清学术 / 205

二、徐世昌倡议修书 / 215

三、夏孙桐与《清儒学案》 / 217

四、《清儒学案》举要 / 223

五、读《清儒学案》商榷 / 230

第十章 学术史著述的创新 / 237

一、梁启超在学案与学术史间的抉择 / 239

二、钱穆与《清儒学案》 / 243

三、学案体史籍的余波 / 254

四、学案解题 / 256

第一章 学案体史籍溯源

作为一种独立的史籍编纂体裁,学案体史籍以专记学派的承传流衍为特色。始而述一家一派源流,继之汇合诸多学术流派为一编,遂由一家一派之学术史,而演为一代乃至数百年众多学派的学术史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,梁启超先生著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,率先对学案体史籍的渊源进行探讨。根据梁先生的卓见,清初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,乃近承朱子《伊洛渊源录》,远绍诸史《儒林传》、《艺文志》和佛家宗史、灯录,有其久远而深刻的文献学和思想史渊源。谨遵梁启超先生之教,追溯其渊源如后。

一、先秦诸子论学术史

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,迄于西周,学在官府,政教合一,并无私门著述文字,故亦无所谓学术流派之可言。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格局,清代乾隆、嘉庆间史家章学诚撰文论究,称之为“官守学业合一”^①。春秋战国间,历史大步跃进。社会的急剧动荡,终于将旧有历史格局打破。私学挺生,云蒸霞蔚,呈现出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气象。

先秦诸子,各倡其说,自成流派。诸家学说皆保存在各自或相关的著述之中,这便是流传至今的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等。只是当时中国史学尚处于其发展的早期,就史籍编纂体裁而言,则是编年体史书的一统天下,因而并无专门的史籍来记录学术流派的传承。不过,在诸子百家的著述之中,学术史的萌芽已经初露端倪。率先在这方面进行较为系统梳理的,当推庄周。

据《史记》卷六十三《老子韩非列传》载,庄周为战国间宋国蒙(今河南

^① 章学诚:《校讎通义》内篇一,《原道》。

商丘东北)人。他与梁惠王、齐宣王同时,早年曾做过漆园吏,后摆脱羁绊,我行我素而终身不仕。其学上承老子,著书十余万言,“剽剥儒、墨”,“洸洋自恣”^①。关于庄周所著书,《史记》未称其名,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则归入道家一类,著录为《庄子》五十二篇。今本《庄子》已非汉时旧观,系经西晋郭象编定,凡作内篇七,外篇十五,杂篇十一,共三十三篇。

在《庄子》卷末的《天下篇》中,庄周谈到了一时“道术将为天下裂”的“百家之学”。根据其所述之先秦学术分野,除讲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的“邹鲁之士”而外,主要是六派。墨翟、禽滑釐为一派,名之为“墨”。承其学者,有“南方之墨者”相里勤、五侯、苦获、己齿、邓陵子等,统谓之“别墨”。墨者之学,“不侈于后世,不靡于万物,不暋于数度,以绳墨自矫,而备世之急”。墨子及其后学,为之孜孜矻矻,“虽枯槁不舍”。庄子认为,“墨子真天下之好也”,然而逆物伤性,因此书中予墨子及其后学的总评价,则是“才士也夫”。宋铎、尹文为另一派,其学以“不累于俗,不饰于物,不苟于人,不忤于众,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,人我之养,毕足而止”为职志,主张“见侮不辱,救民之斗,禁攻寝兵,救世之战”,提倡“情欲寡浅”,并以此周行天下,“强聒而不舍”。第三派则由彭蒙与田骈、慎到师弟倡立。其学奉“古之道人,至于莫之是、莫之非而已”为师门之教,讲求“齐万物以为首”,憧憬“物我一体”的浑然境界。第四派是“以本为精,以物为粗,以有积为不足,澹然独与神明居”的关尹、老聃一派。庄周于此派之学最为服膺,推作“古之博大真人”。第五派为庄周所自创,据称其学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,而不敖倪于万物,不谴是非,以与世俗处”。因而他甚为自负,于一己之学大加张扬,称为:“其于本也,宏大而辟,深闳而肆。其于宗也,可谓稠适而上遂矣。”在庄子看来,唯有其学将长留于天地间,用他的话说,就叫做:“其理不竭,其来不蜕,芒乎昧乎,未之尽者。”最后一派便是以善辩名家的惠施、桓团、公孙龙。庄子虽然赞赏其雄辩之才,但是认为“其

^① 《史记》卷六十三,《老子韩非列传》。

道舛驳,其言也不中”,因而痛惜其仅能以善辩而得名。他就此喟叹:“惜乎惠施之才,骀荡而不得,逐万物而不反,是穷响以声,形与影竞走也。悲夫!”^①

继庄子之后,对一时学术流派加以评述者,则是荀子。荀子名况,战国末赵国人。《史记》卷七十四《孟子荀卿列传》称之为荀卿。据载,他五十岁始游学于齐,时当齐襄王在位。由于田骈等人皆已故世,荀子遂以老师宿儒见称于世,三度尊为齐国祭酒。后遭谗言诋毁,离齐往楚,为春申君所用,任兰陵(治所在今山东苍山县西南兰陵镇)令。春申君死,荀卿职废,于是客居兰陵,以课徒著述终老。他“嫉浊世之政,亡国乱君相属”,遂“推儒、墨、道德之行事兴坏,序列著数万言而卒”^②。荀卿之所著书,司马迁亦未详其名。东汉班固著《汉书》,于《艺文志》著录为《孙卿子》三十三篇。荀卿何以称孙卿?据唐初颜师古注《汉书》,称:“本曰荀卿,避宣帝讳,故曰孙。”^③开元年间,司马贞著《史记索隐》,承袭颜师古说,亦称:“谓之孙卿子者,避汉宣帝讳改也。”^④尔后,历代学者相沿不改。直至清代乾隆末,谢墉著《荀子笺释》,始出别解,指出:“荀音同孙,语遂移易。……以为避宣帝讳,当不其然。”^⑤至于卷帙,《汉书》以后,《隋书》、《旧唐书》之《经籍志》则作十二卷。之后,唐人杨倞注释本通行,始作二十卷、三十二篇。今日所存,即杨氏注本篇第。

荀子之学,推尊孔子、子弓,并由此上溯而祖述舜、禹。在《荀子》卷三《非十二子篇》中,他对先秦学术流派进行了一次批判性的总结。就宏观的学术分野而言,一如庄周,荀况亦在孔子、子弓之学外,将各家学术区分为六派,只是具体分合略异于庄子。他所分六派皆各以二人为代表,依次为:它嚣、魏牟;陈仲、史鳢;墨翟、宋钐;慎到、田骈;惠施、邓析;子思、孟

① 《庄子》卷三十三,《天下篇》。

② 《史记》卷七十四,《孟子荀卿列传》。

③ 颜师古:《汉书》卷三十,《艺文志》注。

④ 司马贞:《史记索隐·孟子荀卿列传》。

⑤ 谢墉:《荀子笺释序》,载王先谦《荀子集解》卷首。

轲。荀况认为,此六派十二子,皆属以各自之说“欺惑愚众”之辈,同样是“饰邪说,文奸言,以梟乱天下。僇宇嵬琐,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”。具体而论,它嚣、魏牟一派,其学“纵情性,安恣睢,禽兽行,不足以合文通治”。陈仲、史鳢一派,其学“忍情性,綦谿利跂,苟以分异人为高,不足以合大众、明大分”。墨翟、宋钘一派,其学“不知一天下、建国家之权称,上功用,大俭约,而慢差等,曾不足以容辨异、县君臣”。慎到、田骈一派,其学“尚法而无法,下修而好作。上则取听于上,下则取从于俗,终日言成文典,反诂察之,则倜然无所归宿,不可以经国定分”。惠施、邓析一派,其学“不法先王,不是礼义,而好治怪说,玩琦辞。甚察而不惠,辩而无用,多事而寡功,不可以为治纲纪”。而对子思、孟轲一派,荀况尤大不以为然,他批评说: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,犹然而材剧志大。闻见杂博,案往旧造说,谓之五行。甚辟违而无类,幽隐而无说,闭约而无解,案饰其辞而祇敬之,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。”荀况认为,思孟一派之说,淆乱孔子学说真相,最为误人子弟。因此,他使用了批评诸子所未曾有过的激烈言词,指出:“是则子思、孟轲之罪也。”荀子主张:“上则法舜、禹之制,下则法仲尼、子弓之义,以务息十二子之说。”他的结论是:“如是则天下之害除,仁人之事毕,圣王之迹著矣。”篇末,荀况的批评所至,下及孔门弟子子张、子游、子夏后学。于此三家后学,他认为皆非圣人之徒,无非得其貌似而已,因而同样冠以“贱儒”之称。他说:“禹行而舜趋,是子张氏之贱儒也。正其衣冠,齐其颜色,矜然而终日不言,是子夏氏之贱儒也。偷儒惮事,无廉耻而耆饮食,必曰君子固不用力,是子游氏之贱儒也。”与三家后学迥异其趣,荀子主张:“彼君子则不然。佚而不惰,劳而不慢,宗原应变,曲得其宜。如是,然后圣人也。”^①

战国末,顺应结束纷乱时局、谋求国家一统的历史大势,荀子的弟子韩非崛起。据《史记》卷六十三《老子韩非列传》载,非本韩国公子,其学宗

^① 《荀子》卷三,《非十二子篇》。

尚黄老，喜言刑名法术。他早年师事荀况，著有《孤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内外储》、《说林》、《说难》十余万言。书流传至秦，为秦王嬴政激赏，喟叹：“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，死不恨矣。”此后，秦国即以获韩非为由而发兵。韩不敌，遣非使秦。惜嬴政听信谗言，迫韩非自杀于狱中。关于韩非所著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为《韩子》五十五篇，《隋书》以下诸史经籍、艺文志，则不载篇数，作二十卷。今本《韩非子》作二十卷、二十五篇。

韩非于所著《显学篇》，沿袭其师荀况的思路，集中对战国末儒、墨二家之学进行批评性总结。他不仅在先秦学术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儒墨并称显学的判断，而且还述及孔子、墨翟之后，“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”的历史。他指出：“世之显学，儒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；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张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颜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孙氏之儒，有乐正氏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邓陵氏之墨。故孔、墨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。”^①韩非所做的总结，虽意在批评儒、墨而非述学史，因之而有嫌疏略，但他的努力无疑是一次可贵的学术积累，为尔后史家之梳理先秦儒、墨源流，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二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的发凡起例之功

在中国史学史上，如果说先秦诸子之论学已初开学术史端倪，那么发凡起例的创辟之功则是由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来成就的。

（一）《史记》的肇始之功

战国末，荀、韩诸子述学，已显示总结先秦学术的历史趋势。秦灭六国，天下一统，按理应是深化这一总结的极好机会。然而秦始皇无视历史潮流，以焚书坑儒、钳制思想，代替了理性的客观总结。到头来适得其反，二世而亡，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。汉兴，除秦暴政，与民休息。惠帝四年

^① 《韩非子》卷十九，《显学》。

(前191),除挟书之律,大收篇籍,广开献书之路。至武帝即位,承文景之治所奠定的雄厚国基,广延百家,推尊儒术,建藏书之策,置写书之官,下及诸子传说,皆得弄藏秘府。通过总结先秦学术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,宛若水到渠成。于是时代的更替,社会的进步,将杰出的史家司马迁召唤到历史舞台上。

司马迁,字子长,西汉左冯翊夏阳(今陕西省韩城市)人。生于景帝中元五年(前145),卒年不详,约在武帝末。其父司马谈,早年学天文于唐都,受《易》学于杨何,又从黄老后学黄子讲习道家之说。武帝建元、元封间(前140~前110),出任太史令,执掌史书纂修。为家学濡染,司马迁自少年时代起即肆力经史,曾向孔安国问《古文尚书》,从董仲舒研求《春秋》公羊家说。二十岁以后,遨游南北,江、淮、沅、湘,会稽、九疑,名山大川皆留下过他访古寻胜的足迹。后东游齐鲁,观孔子遗风,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,风尘仆仆,满载而归。凭此阅历,仕为郎中。元封元年(前110),奉使西南,北归洛阳。时值其父弥留之际,以撰著史书郑重相嘱。父卒三年,司马迁秉遗命出任太史令,承先人未竟之志,排比故事,整齐世传,致力于上古迄汉初历史的撰写。天汉三年(前98),因替李陵投降匈奴事辩解,激怒武帝,惨遭腐刑。虽蒙受此一奇耻大辱,但为完成父子相守之业,他忍辱负重,发愤撰著,终在逝世前如愿以偿,成就了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^①的不朽巨著《史记》。

《史记》突破《春秋》以来编年体史籍的旧有格局,既取其年经月纬、时序分明之长,又弃其首尾割裂、取舍失当之短,以纪、表、书、传之目而区分类聚,成为贯通古今的一部别开生面的史籍。全书一百三十卷,“纪、传以统君臣,书、表以谱年爵”^②,上起黄帝,下穷汉武,开创了崭新的纪传体史籍编纂体裁。也正是在这一卓有成效的创新之中,司马迁为学术史的编纂提供了成功的雏形。就学术史编纂而言,《史记》的发凡起例之功,主要

① 司马迁:《报任少卿书》,载《汉书》卷六十二《司马迁传》。

② 刘知幾:《史通》内篇卷一,《六家》。

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：

首先，《史记》承诸子百家之后，对先秦学术做了一次别具只眼的总评。在该书卷一百三十《太史公自序》中，司马迁引述其父之说，离析先秦学派为六家，即阴阳、儒、墨、名、法、道德。在谈、迁父子看来，阴阳家虽有“序四时之大顺”的功绩，但预卜吉凶，危言耸听，则“使人拘而多所畏”。儒家倡言名教，“序君臣父子之礼，列夫妇长幼之别”，其礼法实为不可移易，但以“六艺”为法，终究“博而寡要，劳而少功”，因而“其事难尽从”。墨家主张“强本节用”，虽属治国正道，但拘执己见，不别尊卑，未免“俭而难遵”，所以“其事不可遍循”。名家控名责实，自有其功，然而“专决于名而失人情”，以致“使人俭而善失真”，则又是其弊窦之所在。法家尊主卑臣，正君臣上下之分，确立不可逾越的统治秩序，功在天下，但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，终“严而少恩”，因之“可以行一时之计，而不可长用”。独有道德家，奉“无为”、“无不为”之教，讲求“以虚为本”之术，浑然物我，顺任自然，因而能究万物之情，能为万物之主。用司马氏父子的话来说，就叫做“道家使人精神专一，动合无形，赡足万物”。所以《史记》的结论是：独有道家“乃合大道，混混冥冥，光耀天下，复反无名”。

其次，全书以记人物生平学行为中心，对自先秦迄于汉初的学术源流进行了成功的梳理。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如实记录，史书的编纂体裁无疑可以是多种多样的。记述学术史亦然，或以事为线索，或以人为中心，尽可百花齐放。不过，归根结底，终究离不开人这样一个历史的主体。有鉴于先秦时代相关史籍存在的局限，诸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世本》、《秦记》等，或偏重记事，或偏重记言，使古代学术的演进淹没在纷繁的政治、军事活动之中；诸子百家之述学，又每每扬己抑彼，不能一览学术源流之全貌。因此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独辟蹊径，选择了以记人为中心的方式，通过对人物生平学行的叙述，凭以反映古代学术兴替的大致脉络。

史家述史，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，往往对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和历